

学术与随笔

搭建“古典”与“现代”的桥梁

——评蒋承勇等著《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

桑 田

摘 要:《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以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与方法,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置于文明—文化史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与阐发,并对文艺复兴产生之缘由、人文主义之内涵及其与中世纪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显现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化创新路径、研究内容的全面性与丰富性以及历史观的辩证性。此外,书中对这一时期“人”的觉醒做出综合性阐释,凸显了人文主义文学之“人学”特质,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人文深度。总体而言,该书作为沟通西方文学、文明研究的“古典”与“现代”之桥梁,为我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力支持。

关键词:人文主义文学思潮;文艺复兴;中世纪;古典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思潮,它开启了西方近现代文学之先声,并在文学思想观念、价值导向上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文学给予了高度重视,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则显得有些冷落,比如对文艺复兴产生之缘由,人文主义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其与中世纪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等,均缺乏深度探究。对作为文学思潮的人文主义文学,迄今几无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这无疑是一种学术缺憾。在倡导“文明互鉴”和“古典学”研究及“重写文明史”的新时代,以重审“古典”的姿态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做出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对构建外国文学研究自主

知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就此而论,蒋承勇等著《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以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与方法,力图挖掘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之本原性特质、历史地位与后世影响,可谓是“重写文明史”“重写文学史”和“古典学”研究的一部难得的学术新著,值得学界予以高度关注。

一、文明—文化视角: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路径

作为“重写”文明史和文学史的一种尝试,《导论》首先追本溯源,从词源学角度切入,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重要概念进行审

慎界定与细致阐发。作者认为：“文艺复兴并非只是古典文化以它原初面貌的‘复兴’或‘复归’，而是包含古典文化元素与新时代新质文化元素的融合，是对古典文化的利用、加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并借以表达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诉求与愿望。因此，文艺复兴是一个包含了新旧文化元素的、内涵丰富而复杂的观念。”^①正因为如此，“人文主义”(Humanism)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文学的指导思想，其内涵不仅是一个复数，而且在文化元素方面包容了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新质文化的多重内涵。这一文化思想复合体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而无法取得学界完全统一的定义，但这并不等于它是“无边”的。特别有学术创意的是，《导论》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精准阐发并指出人文主义思想与中世纪文化及“古典”文化的渊源关系。作者认为：“人文主义思想其实并不是在时间概念上的那个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而是早在中世纪就开始孕育、发芽……是接受了中世纪的文化‘遗传’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人文主义思想本身包含了中世纪的文化基因或元素。这不仅意味着中世纪社会与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温床与摇篮，更意味着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历史包容性和内涵的丰富复杂性。比如，文艺复兴人本意识就包含了中世纪的宗教人本传统以及其他人文元素。”^②这种对人文传统演变之传承性的多角度剖析，廓清了学界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既有认识，具有鲜明的学术创新性。

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研究，不能仅仅就文学谈文学，而要将其置于文明—文化史演变的大背景中追根溯源，探寻其演变的多重缘由及基本特质的成因。在这方面，《导论》做出很好的尝试。《导论》将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置于文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对人文主义文学蕴含的中世纪文化元素、古希腊文学的原欲意识、古罗马的政治理念等进行跨学科阐释，对人文主义文学中蕴含的政治、教育、宗教、科学等内涵做出多角度透析，从而大大拓展了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展现出这个横跨欧洲大陆诸多国家、蔓延了三百余年的文学思潮之波澜壮阔图景和内涵的丰富复杂性。《导论》由此

也显示了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化创新路径，体现了作者长期以来在文学史、文学思潮及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研究方面的一贯风格。

二、修复“断裂”：文学史研究之辩证思维

国内外曾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欧洲中世纪的终结与现代社会的开端；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本质特点。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一方面，这种划分倾向于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关系视作断裂(rupture)而不是延续(continuity)；另一方面，它也将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人文主义文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斗争性视作问题的焦点：人文主义文学的“进步”常常表述为反教会、反神学、以人性反对神性等。在此种人为设置的二元对立观念中，中世纪便成了“黑暗时代”。

《导论》则摆脱成见，在对“黑暗时代”这一概念的原义及其流变进行考察后指出，当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首次使用“黑暗时代”这一词汇时，他笔下的“黑暗”并不指向基督教文化导致的“蒙昧状态”，而是指向被北方蛮族所毁坏、削弱并最终覆灭的西罗马帝国。质言之，最初的“光明”与“黑暗”指涉罗马文化与蛮族文化，而在后来的史学家笔下，这组对立概念逐渐被古典文明与中世纪神学的对立所置换。^③时至今日，国内学界虽然已不再将基督教神学主导的中世纪视作“黑暗时代”，但对于扫除另一重“黑暗”，即对“蛮族”文化的研究还未充分跟进。《导论》认为，正是这个被蛮族入侵的西罗马帝国，演化出了现代的欧洲。“蛮族文化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各民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意识等文化元素上，这些元素逐渐被融入‘两希’大文化构成的格局中，对欧洲文

①②③ 蒋承勇、肖丽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第2、41、27-28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

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至于“黑暗”说导致的有关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是延续抑或断裂的讨论,如今学界虽然不再持非此即彼的观点,但就现有的文学史教材及论著而言,“断裂说”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研究的掣肘依旧存在。最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②的但丁(Dante Alighieri),不是被放在中世纪加以介绍(如郑克鲁等主编《外国文学史》教材^③),就是被归入文艺复兴时期进行研究(如王秋荣等主编《西方文学思潮概观》^④)。这两种理解显然都是失之偏颇的,因为但丁正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延续”而非“断裂”的例证。

要修复“断裂”并还原“延续”之事实,首先须对这一判断背后的观念预设予以纠正,即对“基督教文化是落后的”这一观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宗教与科学、人权与神权的极端对抗性等观点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正是这些预设的观念使得20世纪国内对欧洲中世纪和基督教文化几乎只作批判性研究,直到9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出现了一些从正面的、肯定的角度研究中世纪和基督教文化、文学的论文及著作。《导论》认为,基督教文化蕴含的理性精神也有对古典理性的继承与弘扬,且其中的“理性精神”与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实验科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结;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精神”传递出的宗教人文主义思想在制约古希腊式的自然原欲的基础上,也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平等、博爱思想提供了滋养,同时还催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及乌托邦思想。概而言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之‘新’,并不是对‘旧’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接纳、整合与延续其文化之合理的人文元素基础上的再造与重生,是一种包容了‘旧’文化基因的新文化”^⑤。

既然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是“延续”而非“断裂”,那么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研究也就必须深入到此前的中世纪文化中找寻其思想胚胎。同时,鉴于人文主义文学作为文艺复兴之主潮的重要地位及广泛影响,对人文主义及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文本或非文学文本的研究

与阐述,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其文学性成就本身,同时也要关注其传递出的政治、宗教、教育、科学等丰富内涵,进而使人文主义文学研究在内容上显现出全面性、丰富性以及历史观上的辩证性。比如,《导论》第七章论述了人文主义文学中的性别意识,重点阐释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人”的觉醒的关系。第八章论及人文主义文学与地理大发现的关系,指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思想上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重要动力,而这一发现又反过来重塑了人的世界观,同时也为人文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以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巨人传》中对新航线的写实性描绘为例,说明地理大发现如何推动了人文主义文学放弃中世纪文学的梦幻与神话,将目光从虚幻的来世转向现实人生。《导论》正是通过对“面”的拓展与“点”的深入,达成了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多层次开掘以及对其人文内涵的历史传承性的立体揭示,进而展现其作为文学思潮研究著作的浑然厚重。

三、人性剖析:文学研究之人文深度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人”被唤醒的时代。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被唤醒的“人”?这涉及了对人文主义文学阐释与理解的核心问题。对此,《导论》分别从哲学、科学、教育学、政治学、性别学等角度出发,对这一时期“人”的觉醒做出综合性的阐释,凸显了人文主义文学之“人学”特质,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人文深度。

从哲学角度看,《导论》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有明显差

①⑤ 蒋承勇、肖丽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第31、77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③ 郑克鲁、蒋承勇主编:《外国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④ 王秋荣、陈伯通主编:《西方文学思潮概观》,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别:处在这一过渡时期,人们“研究自然、研究自我,都是为了发现自然中的奇迹,彰显上帝的大德和全能”^①。质言之,人文主义虽然强调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有所凸显,但并不意味着人对神的远离乃至抛弃。《导论》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除了崇尚人的感性本质之外,也弘扬人的理性本质。人的本质不仅仅是情感与原欲,还有理性和智慧,其间的“理性”既有古典哲学的智性精神,也有希伯来—基督教的宗教理性精神——宗教人本意识,“神性”依然是人文主义文学中“人”的重要内涵。从科学与教育的角度看,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化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启迪,同时也得益于人文主义教育对人智的开发,这种新式教育观念在批判以往经院教育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教学内容、扩大教育对象、增设新学科、革新教育方法、更新教学语言等举措,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论》通过对《巨人传》等作品的剖析,阐发了人文主义教育对崭新的“人”的形象的塑造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此外,觉醒的“人”对其所处的政治世界也有所希冀:“探讨民族独立与国家治理等政治问题,也是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②为此,《导论》单辟一章,从“公民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切入,以人文主义文学中浸润了作家个人政治思想的虚构作品为依托,联系这一时期出现的拉丁语与俗语之争及乌托邦文学的中兴,对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及政治理念进行系统梳理。《导论》认为,人文主义文学对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开明政治的呼唤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政

教分离制度,同时也带来了欧洲现代性的负面问题,如种族主义及欧洲中心论思想等,而这些问题也同样值得深入研究。^③作者以非凡的学术气度与深厚的理论功底深度还原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辉煌气派与人性的张扬袒露,使这一文学思潮研究的最新成果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学术风貌。

总之,《导论》所呈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不仅勾连其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均属“古典学”范畴)之人文血脉,而且以其新质的人文思想为近现代西方文学和文明提供了价值核心,这一文学思潮可谓是西方文学和文明从“古典”到“现代”之桥梁,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可以说,《导论》通过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的重新审视与阐发,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研究内容的原创性、研究结论的前沿性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它本身也是沟通西方文学和文明研究从“古典”到“现代”的桥梁,并为我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力支持。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22YSXK03ZD)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桑田,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学、比较文学。

①②③ 蒋承勇、肖丽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第15、200、200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